



衛三畏與《中國總論》

S.W. Williams and *The Middle Kingdom*

12-16

顧 鈞 (Gu Jun) *

法國學者考狄在《西人論中國書目》中將《中國總論》放在第一部《中國總說》的第一類《綜合著作》中，¹ 這是放入這一類別中的第一部美國著作，從這個意義上講，將《中國總論》說成是美國漢學興起的標誌，應該是符合事實的。而該書的作者衛三畏又恰好是美國第一位漢學家。本文將就其人其作做一番探討。

一、美國第一位漢學家——衛三畏

1783年9月3日英美簽定《巴黎和約》，北美十三州殖民地經過長期（1776-1782）艱苦的戰爭和談判，終於脫離英國的桎梏，正式獨立。獨立之初，百廢待興，爲了尋求解決獨立後的經濟問題，若干美國人立刻開始將他們的目光投向中國。1784年8月28日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在黃埔下碇標誌著中美之間直接接觸的開始，該船商務代理人山茂召（Samuel Shaw）的日記也由此成爲美國人有關中國的最早記錄。接踵而來的便是外交官。1832年被傑克遜總統（Andrew Jackson 1829-1837）派往亞洲的羅伯斯（Edmund Roberts）和羅森伯格（W.S.W. Ruschenberger），都有著作傳世。然而商人和外交官對中國的描述往往過於簡單和膚淺，沒有引起美國讀者的注意。美國人在建國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內是靠閱讀歐洲人的著作來瞭解中國的。18世紀末、19世紀

初歐洲先後有四個使團²出使中國，產生了一系列著作。這些著作在美國影響很大，因爲所有的作者都宣稱他們看到了中國的內地，而不像商人那樣只是局限在廣州、澳門兩個港口。另外，歐洲早期的一些漢學名著，如門多薩（Mendoza）的《中華大帝國史》和杜赫德（Du Halde）的《中華帝國全志》也是希望瞭解中國的美國人的案頭之書。這一情況直到1830年後隨著美國傳教士的陸續來華才得到改變。美國學者伊薩克斯指出：「在中國人於幾個世紀留在美國人心目中的印象方面，傳教士比商人或外交官起的作用要多得多。」³ 正是在最早來華的一批傳教士中，產生了美國第一位漢學家——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衛三畏於1812年9月22日出生於紐約州伊薩卡（Utica），他的父母是當地長老會的成員。1832年，紐約的長老會向廣州的美部會傳教站運送了一套印刷機器，並請衛三畏的父親威廉·威廉斯（William Williams）幫助他們尋找一名年輕的印刷工。威廉斯立刻推薦了自己的兒子。1832年7月美部會秘書安德森正式任命衛三畏爲廣州傳教站的印刷工。在接受了一段時間的印刷方面的訓練後，衛三畏於1833年6月起程前往中國並於同年10月抵達廣州，從此開始了他在中國長達40年的工作生涯。在最初的二十年中，他的主要工作是編輯和印刷《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 1832-1951）。

* 作者係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教授

1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Paris, 1904, p.85.

2 分別是1792年英國馬戛爾尼（Macartney）使團，1794年荷蘭蒂進（Isaac Titsingh）使團，1816年英國阿美士德（Amherst）使團，1821年俄國季姆科夫斯基（Timkowski）使團。

3 哈羅德·伊薩克斯：《美國的中國形象》，於殿利等譯，北京：時事出版社，1999年版，頁172。



1853 年他接受了美國赴日本使團的翻譯任務。以後長期在美國駐華使團任職，從而脫離了美部會。1877 年他回美國後被耶魯大學聘為該校第一位中國語言與文學教授，從而也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漢學教授。衛三畏於 1884 年 2 月 16 日死於康涅狄格州紐黑文（New Haven）。

與美部會到中國的其他人員，如裨治文、特雷西等不同，衛三畏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傳教士，他沒有接受過神學教育，也沒有被授予過神職。在美部會的正式文件中，他的身分一直是印刷工。但他在中國的活動，與一般傳教士並無不同，事實上他在許多場合也被稱為傳教士。與其他傳教士不同的是，衛三畏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有特別的愛好。1833 年他剛到中國，就開始學習中文。在廣州和澳門長期居住期間，始終沒有間斷。1846 年他加入美國東方學會（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⁴ 1881 年他成為該學會主席，這也表明了他在漢學研究領域的地位之高。

衛三畏在漢學著作包括：《簡易漢語教程》（*Easy Lessons in China*, 1842）、《中國地志》（*A Chinese Topography*, 1844）、《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 1848）、《我們與中華帝國的關係》（*Our Relations with Chinese Empire*, 1877）等。其中《中國總論》是他的代表作。

二、《中國總論》

1844 年底衛三畏回美國後，在全國各地發表了關於中國的多次講演，受到熱烈歡迎。1846 年衛三畏決定將這些講演用文字寫出來，形成一本關於中國的書稿。為此他來到了紐約，住在他兄弟的家中。在其後的兩年中他除了繼續發表演講外，幾乎將所有時間全部用於寫作，直到完成為止。書稿於 1848 年被 Wiley & Putnam 出版，這就是《中國總論》。該書 1848 年初版後，多次印刷，很受歡迎，不僅成為研究中國的學者們的參考書，而且作為中國歷史文化課的教材而被一些英美教育機構長期使用。《中國總論》的大部分還被翻譯成德文和西班牙文出版，在西方的影響很大。1877 年衛三畏回到美國後，又對《中國總論》做了一些修改，修訂版

於 1883 年出版，在 1848 年初版的基礎上有所提高。

《中國總論》分上下兩卷，長達 1200 頁。全書分 23 章，比較全面地介紹了中國的社會、政治、文化狀況及其歷史根源。這 23 個章節是：地理區劃與特徵、東部省份、西部省份、屬國、人口、自然資源、法律與政府機構、司法、教育與科舉、語言結構、經學、史學與文學、建築服飾飲食、社會生活、工藝、科技、編年史、宗教、基督教在華傳播史、商業、中外交通史、中英鴉片戰爭、戰爭的發展與中國的開放。不難看出，《中國總論》幾乎涵蓋了中國社會與歷史文化的所有重要方面，將其書名定為「總論」，是很貼切的。這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是建立在作者對中國全面而深入瞭解的基礎上的。在寫作《中國總論》之前，衛三畏已經在《中國叢報》上發表過一系列關於中國的文章，其中關於中國地理、政區方面有 16 篇，民族特性和民俗文化方面有 21 篇，博物學（自然史）方面 15 篇，科技工藝方面有 11 篇，語言、文學方面有 14 篇。⁵ 這些文章都為他在寫作《中國總論》的有關部分時打下了扎實的基礎，也使他在短短兩年內寫出這部巨著成為可能。

《中國總論》內容豐富，其中有關中國古代文化的部分將是我們討論的第一個重點。因為這部分的好壞將直接關係到一部漢學著作的價值。我們發現，《中國總論》對中國古代的文化成就做了大量真實的敘述，並且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積極的評價。衛三畏對作為中國古代思想文化核心的孔子學說是這樣進行評述的：「孔子哲學最大的特點是對尊長的服從，以及溫和正直地和同輩人交往。他的哲學要求人們在現實世界中，而不是從一個看不見的神靈那裏，尋找約束力，而君主也只需要在非常有限的範圍內服從一個更高的裁判。從子女對父母的責任、榮譽和服從出發，孔子進而向人們灌輸妻子對丈夫、臣民對君主、大臣對國王的責任，以及其他社會責任。孔子認為，政治的清白必須建立在個人正直的基礎上，在他看來所有進步的開始都蘊藏在『認識你自己』之中。無庸置疑，他的許多思想是值得讚揚的。就是與希臘和羅馬聖人的學說相比，他的作品也毫不遜色，並在兩個方面大大超出：一是其哲學被廣泛應用於

4 該學會於 1842 年在麻塞諸塞州成立，是一個專門研究東方的、獨立的、非營業性的學術機構。

5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index.



他所生活的社會，二是其哲學突出的實用性質。」⁶ 這段論述十分準確也很精闢，抓住了以「禮」和「仁」為核心的孔子思想的精髓。確實，與同時代的西方思想家相比，孔子學說的「實踐理性」色彩十分明顯，它的最大特點，正如李澤厚所總結的那樣，「不是用某種神秘的熱狂而是用冷靜的、現實的、合理的態度來解說和對待事物和傳統」，它是一種「理性精神或理性態度」。⁷ 對此，衛三畏也有深刻的認識。

不僅如此，衛三畏還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孔子學說對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產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在其他民族文化中是很難找到的。衛三畏將這種現象歸結為中國人對教育的重視：「中國偉大的立言者對其同胞的良好影響要遠遠超過西方的聖人們，如柏拉圖、塞內加、亞里士多德。直到今天仍是這樣。……對全民進行教育的重要性在孔子之前就得到承認，並且得到很好的實行，而在同一時期其他國家還沒有這樣的制度。……《禮記》中寫道：『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就我所知，這比同時代的猶太人、波斯人、敘利亞人都要優越得多。」⁸ 這是完全符合歷史事實的。如果從漢武帝元朔年間中國建立最早的學校算起，中國的教育至少有長達兩千年的歷史，而在這兩千年中，以孔子思想為核心的儒家經典一直是古代中國教育的最重要內容。出於同樣的原因，經學也一直是古代中國學術的中心，對此衛三畏在書中也有所論述。此外，《中國總論》還對中國古代文學、史學、藝術等方面的成就都做了詳細和客觀的描述，這裏不一一列舉。

《中國總論》中這些對中國古代文化成就的論述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也充分反映了衛三畏作為一個漢學家的水平。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從當時大的社會背景來

考察，則這部分內容的社會價值就會凸現出來。衛三畏在《中國總論》「前言」中說，他寫這部書的目的之一，在於「剝離中國人和中國文明所被給予的那種奇特而無名的可笑的印象」。⁹ 這種印象肇始於 18 世紀中葉的歐洲。美國於 18 世紀末建國，又深受歐洲的影響，所以美國人從一開始就「習慣以輕蔑和厭惡的口氣談論中國人」。¹⁰ 中美之間的直接接觸不僅沒有使情況好轉，反而惡化了。

最早來華的山茂召在日記中寫道：「儘管中國政府普遍地受到高度讚揚，但是我卻懷疑它是所有文明國家中最為壓制的政府。」¹¹ 此外，他對中國的宗教和風俗也殊無好感，批評中國崇拜偶像、盛行迷信、篤信吉日以及一夫多妻。¹² 山茂召似乎開了一個壞頭。以後的美國商人和外交官對中國的看法雖然各不相同，但總的來說，他們的批評遠遠多於讚揚。他們向美國傳遞的是這樣一個中國人形象：衣著滑稽、迷信、不老實、狡猾、殘忍、對政府的專制統治和社會的停滯不前束手無策。¹³ 到了鴉片戰爭以後，這一形象進一步泛濫，成為美國人普遍接受的中國觀。

這種中國觀的形成有種種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對於中國的無知。外交官羅森伯格對中國的批評最充分地暴露了這一點：「他們是殺害自己幼小後代的人，是一個最邪惡的犯罪非常普遍的國家，……在那兒商人欺騙他們的同胞和外國人；在那兒對語言的知識構成了科學的最遙遠的邊界；在那兒語言和文學簡直不足以表達生活的共同意圖，並且幾個世紀以來沒有改進；在那兒道德的衛護者是卑鄙小人；在那兒公正就是貪贓枉法，其程度在地球上無處可比；在那兒，偉大的立法者孔夫子雖然受到很大的尊敬，但卻經不起推敲，除非我們考慮到他所處時代的無知而原諒他作品的貧乏；在那兒，從皇

6 S. W.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 & London: Wiley and Putnam, Vol. 1. p.530.

7 李澤厚《中國思想史論》上，安徽文藝出版社，1991年，頁34。

8 *The Middle Kingdom*, Vol. 1, p.421.

9 *The Middle Kingdom*, Vol. 1, p.xiv.

10 William Speer, "Preface", *The Oldest and the Newest Empir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ittsburgh, PA: Robert S. Davids & Co.1877.

11 Samuel Shaw, *The Journals of Major Samuel Shaw*, Boston: WM. Crosby & H. P. Nichols, 1847, p.111.

12 *The Journals of Major Samuel Shaw*, pp.197-199.

13 S. C. Miller, *The Unwelcome Immigrant*,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p.36.



帝到最低級的官員，一個剝削另一個。」¹⁴ 如果考慮到羅森伯格受過良好的教育，那麼上述的言論就更讓人覺得可怕。在這樣的時代風氣中，作為熟悉中國的衛三畏顯然覺得有必要糾正國人的看法。

與由於無知而對中國產生偏見的美國人相比，由無知而對中國冷漠的人可能更多。這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總論》在被 Wiley & Putnam 出版社接受之前會遇到種種挫折，許多出版商拒絕這部巨著的理由就在於擔心它不會引起人們的興趣。而這部書出版後受到熱烈歡迎的事實，又說明 19 世紀上半葉的美國人儘管關注的焦點是國內的事務，但他們仍然希望瞭解世界其他地區。此外，這一時期美國人的民族情緒日益生長，美國人自己寫的有關中國的著作顯然比同類的歐洲人著作更容易受到青睞，這也是《中國總論》受歡迎的原因。

《中國總論》無疑使美國人對大洋彼岸的文明古國有了全面和深入的認識，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還是這部《中國總論》，卻在另一方面加深了美國人對當代中國的偏見。

1848 年當衛三畏準備出版《中國總論》時，他說他的另一個動機是「增加基督徒對於中國人民的關注，並且展示他們是多麼值得用基督教的教義去教化，施行這樣的教化可以使他們的政府免於混亂，使人民免於鴉片造成的墮落和對靈魂的永久傷害。」¹⁵ 顯然，衛三畏希望這本書能夠有助於基督教在華的傳教事業。眾所周知，美國自建國以來就實行政教分離的政策，所以傳教工作常常得不到美國政府的支援。早期的傳教活動很多是由商人贊助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大衛·奧立芬 (David W. C. Olyphant)。衛三畏和許多其他美國傳教士就常常免費乘坐他的商船往返中美。但商人的支援畢竟有限。鴉片戰爭後中國門戶敞開的形勢使傳教士們意識到時機的來臨，此時他們更需要支援。在這樣的背景下，衛三畏當然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夠增加美國人對於基督教

在華傳教工作的支援。這一希望直到他晚年修訂《中國總論》時也沒有改變，衛三畏說：「一個念頭刺激著我一生從事這一工作，它就是這樣一種希望，傳教事業能夠發展。在這個事業的成功中蘊藏著中國作為一個民族的拯救，既在道德方面，也在政治方面。」¹⁶

作為傳教士，衛三畏很難不受傳教目的支配，這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這一寫作目的給《中國總論》帶來的一個直接後果是：為了說明中國人多麼需要基督教，衛三畏在一些章節的論說中不時地誇大其詞，甚至歪曲事實。¹⁷ 他這樣描寫當時中國的情況：「政府官員……賄賂，與犯罪分子沆瀣一氣，諂媚上級，欺壓百姓。而社會也顯示出許多令人厭惡的特徵——敵對的家族互相仇殺，強盜橫行，衙役助紂為虐，真理完全被拋棄，自私是行動的唯一原則，所有不安定的因素都惡性發作而沒有得到控制。」¹⁸ 不可否認，鴉片戰爭前後的中國社會確實存在著許多問題，但這些問題並非靠基督教就能解決。中國需要的是西方近代先進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衛三畏認識不到這一點，一味強調基督教對中國的作用，他的見解因此也就不比其他傳教士更高明。

綜上所述，衛三畏在寫作《中國總論》時是服從於兩個目的的。這兩個矛盾的寫作目的或許可以用這樣的邏輯統一起來：中國之所以值得用基督教來拯救，就是因為它曾擁有燦爛的古代文明，而它近代的衰落正是因為缺乏基督教。這樣我們就把衛三畏完全看成是一個傳教士，但是《中國總論》中的一些話語又讓我們不能堅持這樣的看法。衛三畏在一處寫道：「我們不想將中國描寫得比它實際得要糟，也不想大談特談它的優點而使人感覺它不需要福音。」¹⁹ 在另一處他寫道：「很容易把中國早期的歷史捧上了天，就像法國作者所做的那樣，但貶低他們也同樣是不正確的，而這是現在普遍流行的做法。」²⁰ 顯然衛三畏希望能以學者的眼光來看待和描寫中國。作為傳教士和作為學者的衛三畏在寫作此

14 轉引自 S. C. Miller, *The Unwelcome Immigrant*, pp.55-56.

15 F.W.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New York & London: G. P. Putnam's Sons, 1889, p.155.

16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p.458.

17 這種做法在當時相當普遍。

18 *The Middle Kingdom*, Vol. 1, p.401.

19 *The Middle Kingdom*, Vol. 2, p.99.

20 *The Middle Kingdom*, Vol.2, p.193.



書是時時處在鬥爭之中的。如上文所述，衛三畏不是一個真正的傳教士，同樣他也不是一個真正的學者。他的這一複雜身分或許可以作為早期美國漢學家處境的最好說明。另外，通觀全書，我們發現，其中描述中國歷史文化的章節佔了大多數。如果以此作為標準，我們應該說，在上述兩個目的中，衛三畏是更傾向於後者的。

通過以上對衛三畏和《中國總論》的分析，我們可以簡單地總結一下初創時期的美國漢學的特點。為了便於說明，我們不妨將《中國總論》與考狄書目中同一類別的歐洲人著作做一簡單比較。我們選擇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和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作為參照系，因為它們分別是 16 世紀和 18 世紀關於中國的百科全書，前者一般被認為是歐洲漢學的開山之作，而後者則是最重要和最具影響的著作。

第一，《中華大帝國史》和《中華帝國全志》都是通過二手材料編輯而成的，實際上是前代和同時代人關於中國著述的匯總。門氏和杜氏都沒有來過中國，而且不懂中文。而衛三畏是精通中文的，《中國總論》完全是衛三畏根據他本人的所見所聞創作的。所以美國漢學從一開始就帶有非常強烈的個人色彩。

第二，門氏和杜氏都是用一種讚美的態度來寫中國的，歐洲漢學是在「中國熱」的背景下產生的。而美國漢學產生於鴉片戰爭以後，這也就決定了美國漢學家不可能再帶著完全讚美的眼光來看中國，和將注意力完全集中於中國古代的文明。中國的變革和近代化問題逐漸成為關注的焦點。如《中國總論》中就開專章討論「中國的開放」問題。這些都預示了美國漢學的現代形態——以費正清為代表的「中國研究」的出現和壯大。

三、結語

《中國總論》是 19 世紀最重要的漢學著作之一，中國學者對這一著作的關注和研究則到了 20 世紀。

根據筆者粗淺的檢索，最早在文章中提到這部著作的是魯迅。魯迅在《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中提到了「威廉士的著作《中國》」，指的就應該是衛三畏的

《中國總論》。魯迅提到這本書，是因為日本作者安岡秀夫在討論中國菜時引用了該書有關中國人「好色」的結論。魯迅稱自己「對於外國人的指摘本國的缺失，是不很發生反感的」，但是對於這樣的無稽之談，魯迅大不以為然，尖銳地嘲笑道：「筵席上的中國菜誠然大抵濃厚，然而並非國民的常食；中國的闊人誠然很多淫昏，但還不至於將肴饌和壯陽藥併合。『紂雖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研究中國的外國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便常常得到這樣——比『支那人』更有性底敏感——的結果。」²¹

有理由相信，《中國總論》這本書曾被翻譯成日文，魯迅可能讀過日文本，但沒有看過英文原作。檢索全書，我們發現衛三畏指責中國人「好色」的那段話出現在下卷中：「這個沈溺於感官享受的民族尋求的許多食物，都是因為它們具有刺激性欲的性質，而且大多數從國外買進的用做食物的產品也是為了這種性質。」²²看來安岡秀夫確是有所本的。

魯迅關注《中國總論》，就像他關注明恩溥（Arthur Smith）的《中國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樣，主要是為了研究中國的國民性。真正把這部著作當做漢學著作來研究始於莫東寅的《漢學發達史》。該書給美國漢學的篇幅非常有限，在描述美國漢學起源時作者寫道：「美國完成獨立在 1783 年（乾隆四十六年），及釋奴戰終，統一南北之集權政府成立，已在 19 世紀中葉（1865，同治四年），收夏威夷菲律賓在 19 世紀末（1898，光緒二十四年），其注意禹域，視歐人晚甚。其國民尚科學重實用，於中國歷史文獻之研究，初極忽視。……衛三畏……其《中國總覽》（The Middle Kingdom, 1848）一書，凡兩巨冊二十六章，敘述中國歷史地理人民政治文學社會藝術等概況，後由其子為復刊，流傳甚廣，為美人中國研究之見端。」²³這段論述不但過於簡單，而且有一些錯誤。但是直到今天，國內學術界對衛三畏其人其作的認識還基本停留在五十多年前《漢學發達史》的水平上，沒有什麼突破。所以拙文對此做了一些探討，並希望引起更多學者的關注。

21 《魯迅全集》第 3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頁 330。《魯迅全集》的注釋中將這本書的出版年代寫成是 1879 年，不正確。版本如本文中所寫：1848 年初版，1883 年修訂版。

22 The Middle Kingdom, Vol. 2, p.50.

23 莫東寅《漢學發達史》，北平文化出版社，1949 年版，第 141 頁。